

新加坡左翼廿九工团对中央政府 增税措施联合发表声明

为了应付财政开支的日益扩大，特别是由於扩军备战的需要而日益增加的国防与内部治安的开支，大馬中央政府採取了一系列严重的增税措施。这不仅是旧有税項的税率被提高了，而且是一些严重地影响民族工商业和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名目繁多的新税項被提出了。这是星馬有史以来最广泛、最大量的一次增税措施。这样的增税措施，在四邦人民深受大馬計劃所带来的大灾大难危害的今天，遭受广大人民的同声譴責和一致反对，是很自然的事。尤其是已經深受經濟对抗、封禁海港、禁止物物交换等等措施之害的新加坡广大人民和工商各界人士，對於大馬政府的不合理增税措施，更加是群情憤慨，怨声载道。作为全星加坡广大有組織工人代表的我們，始終一貫地站在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和全星人民利益斗争的最前线，對於这样深广，这样严重地影响各阶层，各民族人民生活的增税措施，是不可能保持沉默的，是自然要表示我們的意見与态度的。

我們認為，今天，我們所遭受到的一切灾难，是反动的大馬計劃和反动的中央政权的扩军备战給我們带来的。沒有这么一項旨在维护英帝国主义利益的反动拼湊計劃，沒有反动的中央政权的扩军备战措施，我們完全有可能不必遭受这种枷锁担子日益加重的苦头，完全有可能过着比較安居乐业的生活。因此，千条万条，祸根只有一条，这就是祸国殃民的反动的大馬計劃。我們远在1963年7月13日在我們当前的最高組織新加坡职工会聯合总会(SATU)的“告各阶层、各民族人民书”里，就已經明明白白的指出这一点：

“随着老早已經背叛了人民立場的行动党政权为了自私的利益在英偷签署了辱国卖民的馬来西亚协定，我們的邦国和全体人民都一致地面对政治主权被严重的剥夺殆尽，面对着經濟財政权益的严重牺牲和丧失，面对着被捲进战争漩涡的威胁，面对着社会动盪不安，以及一切其他严重的後果”。

今年7月21日，在新加坡发生的华巫民族冲突的不幸事件，已經用鮮血的經驗教訓，證明了我們进步工会团体过去分析的正确性。現在，大馬中央政权的不合理增税措施，又以广大人民深受其苦的經驗教訓，再一次證明了我們进步工会团体过去分析的正确性。只要强硬拼湊起来的大馬不被解散的一天，只要反动的大馬中央政权扩军备战的步伐不被阻止下來的一天，必然会有更多更加使广大人民深受其害的現實例子，來进一步証明我們进步工会团体过去分析的正确性。

我們从来不反对一切旨在改善广大人民經濟生活的合理的徵稅政策。但是，我們坚决反对一切只抽穷人税，不抽富人税，只抽民族资本家税，不抽外国资本家税的反动的，不合理

的徵稅政策。大馬中央政府是执行著後一种的徵稅政策。今天的徵稅措施，就是这种不合理的徵稅政策的具体表現。从总的来看，在大馬中央政府这次增税的总增加收入的一亿四千七百万元中，有八十点六巴仙是来自間接税的，这就是說，其中的一亿一千四百多万元，是抽自穷人身上的。即使在份額上只佔极少数目的直接税，也不是完全沒有任何“合法”的逃稅漏洞的。由於这不合理的徵稅政策的綱开一面，資本盈利税和遗产税，是完全可以逃避的。这就是說，富人有很大机会可以逃稅。从个别来看，在旧有税項税率的提高上，中央政府首先是提高間接税，其次是提高屬於直接税的个人所得税之下层納稅人的税率。對於大官翁，个人所得税税率調整後，他們反而可以比过去少納一些。在新增加的税率項方面，营业额税和薪金税、租税的冲击对象主要也是集中在中小民族资本家身上。由於民族资本家資本少，資本构成低下（用人多，用机器少），他們才是这两項新税的直接打击者，虽然他們最終可以轉嫁給消費者，但是，这样也就影响了他們产品的市場，归根到底是难免破产。至於外国资本家，如果不是已經成为壟斷性組織，却可以通过纵的联合（其实是併吞）輕易地逃避了营业额税。

事实很明显，大馬中央政府今天的增税措施，是不合理的，反动的。即使像李光耀之流的人物，也由於人民的怨声载道和一致反对，由於這項增税措施的反动本質极其明显，难以遮盖，而不得不做一些抨击，李光耀政府對於当前的增税措施，是要負起完全責任的，是难逃其罪的。如果不是李光耀政府出卖新加坡政治主权，財政权益，如果不是李光耀政府基於私自利益签下大馬协定，今天的新加坡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就不必身受增税之苦，就不必每年将本邦稅收的40%奉送給人家，还要挑起增税的负担。李光耀在中央議會獻計上策，要中央政府用“保釋”和“体諒”的怀柔政策來平息民憤，撫恤民艰。我們愿意在此指出，今天的民憤民艰，都是反动的大馬計劃帶來的不合理的增税措施所引起的，要平息民憤，撫恤民艰，就得取消一切不合理的增税措施，真正执行一条大抽富人税，小抽穷人税，大抽外国资本家税，小抽民族资本家税的合理的徵稅政策。

到時候了！在这民情沸騰、怨声载道的时刻，我們呼吁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加强团结一致，抗拒不合理的增税措施及要求中央政府放棄馬来西亚計劃！